


财经学术文丛

Jin Merchants'
Institution Logic

晋商的制度逻辑

郑文全 卢昌崇 ◎ 著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晋商的制度逻辑

郑文全 卢昌崇 ◎ 著

FE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 Economics Press

大连

© 郑文全 卢昌崇 200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晋商的制度逻辑 / 郑文全, 卢昌崇著. —大连: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9.12

(财经学术文丛)

ISBN 978-7-81122-881-6

I. 晋… II. ①郑… ②卢… III. 工商企业—企业管理制度—研究—山西省 IV. ①F279.27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241698 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

(大连市黑石礁尖山街 217 号 邮政编码 116025)

教学支持: (0411) 84710309

营销部: (0411) 84710711

总编室: (0411) 84710523

网 址: <http://www.dufep.cn>

读者信箱: dufep@dufe.edu.cn

大连北方博信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发行

幅面尺寸: 150mm×220mm

字数: 125 千字

印张: 5

印数: 1—1 500 册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高 鹏 孙 越 张 贺 张旭凤

责任校对: 刘贤恩 孙 平

封面设计: 冀贵收

版式设计: 刘瑞东

ISBN 978-7-81122-881-6

定价: 20.00 元

致 谢

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乔家
字号：一个蕴含着现代企业本质特征的
经济组织》和教育部人文与社会科学“十
五”规划课题《身股制：一项挑战西方
经典企业理论的制度安排》的资助。

前 言

本书脱胎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课题《乔家字号：一个蕴含着现代企业本质特征的经济组织》和教育部人文与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身股制：一项挑战西方经典企业理论的制度安排》，是一本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及其相关理论探究晋商兴起、企业制度、经营策略及晋商衰落背后所蕴含的制度逻辑的著作。对于晋商兴起的经济缘由，我们主要选择“票号的本质”问题，从分工经济的角度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加以分析；对于晋商企业制度的效率及与西方经典企业制度的整体性比较，我们主要运用现代企业理论，从耦合与嵌入的角度进行分析；对于晋商经营策略的经济理性，我们主要选择“相与制度”，从债务合约及考核成本节约角度展开分析；对于晋商的衰落原因，我们主要从产权与企业创新的角度，辨析与整合各种解释并构建其衰落的传导机制。这些研究构成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涵盖晋商产生、发展与衰落全过程的具有分析经济史性质的研究，使我们能够从多个方面洞悉蕴含并贯穿在晋商五百年发展史中的经济理性和制度逻辑。

一、本书的研究缘起

作者关于晋商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当时我国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公司制改革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实践对能够指导我国企业制度改革的理论创新提出了新的要求。本书的作者之一卢昌崇教授躬逢其盛，也参与到这一理论的创新过程中，并主要从职工持股以及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过程中新老三会的关系协调方面展开研究。当时取得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有 1993 年发表于《中国工业经济研究》（后改名为《中国工业经济》）第 8 期的《论企业职工持股模式再造》和 1994 年发表于《经济研究》第 11 期的《企业治理机构及新老三会关系论》等文章，其中发表于

《经济研究》的有关新老三会的文章还被收入天则经济研究所推出的代表当时中国经济研究最高水平的《中国经济学——1994》。在研究过程中，卢昌崇教授认识到由于企业制度深刻地嵌入到一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因而现代企业制度并非只有英美和日德等一两种经典模式，我国也应该并且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建立符合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一直没有找到好的企业例证。由于作者对中国明清经济史特别是鸦片战争以来的诸如张謇等中国精英知识分子实业救国的历史很感兴趣并有相当的积累，于是转而决定从这方面寻求突破。及至1995年读到有关乔家字号的介绍文字后，卢昌崇教授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能够证明中国也可以有自己独具特色的企业制度的绝佳例证，自此开始长期关注晋商的研究。

2001年，卢昌崇教授有关晋商企业制度与西方企业制度比较的思考已经呼之欲出，恰好这一年本书作者之一郑文全报考卢昌崇教授的博士生，于是卢教授便将自己的诸多思考和盘托出并指定郑文全以乔家字号为例完成一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的申请书，后来在对此份申请书进行修改的过程中，刘宝宏也参与进来。经过精心论证，这一课题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只是考虑到我国向来不重视商业史的建设，以一个案例来研究晋商企业制度恐怕面临着史料约束，为降低资助风险，于是将本课题由一般面上项目转为小额资助项目。改为小额资助项目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金额大大减少，根本不足以支持这一课题的完成，好在当年本课题组围绕股份制论证的教育部人文与社会科学“十五”规划课题也获得了立项，才使我们有关晋商企业制度的研究得以持续进行。

正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所担心的，课题在研究的过程中的确面临严重的史料约束。古人轻商，即使是富商巨贾，亦少有记载，很多一般性的晋商史料都是从“虎行有风，河行有迹”的民间传说和晋商后人的采访中整理出来，要找到一个企业更详细的经营史料

难度就更大了。为实现研究目标，本课题组随即调整了研究计划，从深入包头与祁县进行实地调查、与晋商研究学者建立学术联系并紧密跟踪晋商研究最新进展、基础理论创新和课题的拓展性研究等四个方面寻求突破。在深入包头的调查中，我们在长期研究包头商业史的历史学教授张贵老先生那里见过在旧房拆迁中抢救出来的被当作裱糊纸的光绪年间复盛公、复盛当的账簿，可惜残破不全，无法用于经济学方面的学术分析。在与从事晋商研究的黄鉴晖等老前辈的学术交往过程中，我们获得了不少启发。在基础理论研究方面我们收获颇丰，寻找到和创新出更有效的理论分析模型，从而降低了研究对历史资料的依赖程度。拓展性研究使我们的研究更是深入到票号的本质、相与制度、晋商衰落背后的经济理性与制度逻辑层面，从而迂回逼近本课题的研究目标。本书正是郑文全和卢昌崇在基础理论和推展性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重新梳理、整合后形成的。

二、本书的内容摘要

本书共分五章。

第1章是“研究概述”，对晋商的历史地位及贡献、晋商研究的百年历程及分类、本书的研究设计以及本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综合介绍。

第2章是“晋商的自发演进性质：基于票号本质的研究”，主要运用新兴古典经济学，从劳动分工角度，对票号这种晋商最重要的企业形式为什么会相对市场交易而存在的本质问题进行了分析，指出票号本质上是市场自发演进形成的劳动分工的产物。这一研究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和金融中介理论对票号本质问题解释的空白或不足，也突破了仅从史学的“开中法”角度解释晋商产生的局限性，揭示了晋商的形成具有自发演进性，其所处的具有自发演进特征的市场环境为晋商企业制度的内发原生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背景。

第3章是“晋商企业制度的耦合与效率：基于乔家字号的研究”。这部分基于乔家字号总结了晋商的企业制度体系，并分析“身股制、

高度两权分离、本地人策略、长期雇佣与年功工资、内部晋升制度和号规”紧密耦合的内在机制及对委托代理问题的解决效率，指出晋商企业制度是依托本土资源形成的一种内发原生型的迥异于西方的高效率的企业制度，对中国特色企业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第4章是“债务合约、考核成本、节约机制与相与制度”。此章的研究分两步展开：首先探究现代社会中债权人用以降低债务人信息考核成本的措施或者机制主要有哪些；其次分析这些一般性的防范措施在晋商的相与制度中是否发挥作用、发挥作用的途径和方式以及与这些措施匹配的其他机制，以期为当代社会债务合约中考核成本节约机制的完善提供启发。研究表明，相与制度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债务合约考核成本的节约机制，它大大节约了晋商的经营成本。

第5章是“晋商的衰落原因：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视角分析”。这部分的研究论证了晋商的衰落根源在于私有产权保护制度的缺乏，而非企业制度的无效率或低效率；同时也揭示了仅有优秀的企业制度而缺乏良好的外部环境仍然难以促进社会经济的良性发展。

作 者

2009年12月

目 录

1	研究概述	1
1.1	晋商历史及贡献.....	1
1.2	晋商研究及其分类.....	3
1.3	本书的研究设计.....	6
1.4	本书的研究内容.....	18
2	晋商的自发演进性质：基于票号本质的研究	35
2.1	山西票号的银行属性.....	36
2.2	现有理论无法圆满解释票号的本质.....	39
2.3	票号的本质：模型分析.....	45
2.4	票号的本质：历史分析.....	51
2.5	结论与启示.....	56
3	晋商企业制度的耦合与效率：基于乔家字号的研究	61
3.1	引 言.....	61
3.2	问题的提出.....	63
3.3	文献评述.....	69
3.4	乔家字号的耦合回应.....	74
3.5	结论与启示.....	87
4	债务合约、考核成本、节约机制与相与制度	99
4.1	两类考核成本.....	100
4.2	抵押、声誉机制与审计制度.....	106
4.3	债权人持股、两权分离及信息公开制度.....	110
4.4	相与制度、考核成本与节约机制.....	115
4.5	结论与启示.....	120

5 晋商的衰落原因：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视角	
分析	128
5.1 引 言	128
5.2 文献评述	129
5.3 企业家创新与企业增长	133
5.4 晋商的产权保护机制	136
5.5 政府财政危机与产权破坏	139
5.6 结论与启示	143
后 记	148

1 研究概述

1.1 晋商历史及贡献

明初至清末，晋商纵横商界五百年，以雄财善贾享誉海内外。鼎盛时期，晋商执国内外贸易之牛耳，垄断了中国票号业；所开商路西达莫斯科，东至大阪、横滨，绵延数万里，各大商号、字号的分支机构遍及大江南北；“平、祁、太”三地富商巨贾坐拥资财数千万两白银，龚自珍和梁启超均称其“海内最富”。

晋商发轫于宋朝，明时即已凌驾徽商之上，至清更是独占鳌头，冠绝十大商帮，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明朝文学家谢肇制在其《五杂俎》中记录：“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江北则推山右。新安大贾，鱼盐为业，藏钱有至百万者，其他则二三十万者则中贾者。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其时，“新安”即指徽州，“山右”即今山西。明人沈思孝在《晋录》中更直截了当地说：“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即使富贵如严嵩之子严世蕃者，论及天下富室，“凡十七家”中商居七席，而“山西三姓，徽州二姓”。1822年，清朝著名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提议将中国内地人多地少省份的人口大规模西迁，但江浙与山西两地“毋庸议”，原因是江浙一带民众羸弱，难胜长途跋涉之苦，而“山西号称海内最富，其民不愿徙”。龚有此议时，距离晋商鼎盛时期尚有半个世纪，因为创立于1823年的第一家票号“日升昌”当时尚未出现，而后来的历史发展表明正是山西票号才将晋商推向了历史的顶峰，使其

“执中国金融之牛耳”。同治与光绪初年，票号已经发展到 26~30 家，除南方商人开设 3 家外，其余均是总号设于平（遥）、祁（县）、太（谷）的山西票号，其分号不仅遍及大江南北，而且也远设于俄罗斯、日本的东京和神户、韩国的仁川和东南亚等地。虽然晋商没有留下完整的统计资料，但从片断的资料中我们仍然惊叹于票号当年创造的巨大商业成就。光绪三十二年（1906 年），仅日升昌票号的 14 个分号，全年收交汇的银两达 32 225 204 两，平均一个分号为 230.2 万两。以此类推，若山西票号有 400 个分号，全年收交汇的银两总额应在 9.208 亿两以上。从存放款来看，即使在票号已经衰落的 1913 年，14 家票号及其 67 家分号的存款仍然达到 25 091 708 两，放款达 31 509 295 两。^①而票号鼎盛时期，更是垄断各种官银汇兑，几乎就是清政府的财政部，同时参与各种近代工业的放款，“汇通天下，利赖九州”名副其实。

晋商经营的商品下至柴米油盐酱醋茶等老百姓开门七件事的“六陈行”，上至绫罗绸缎珠宝玉石等富贵人家的奢侈用品，也涵括俄罗斯与蒙古广袤草原上的居民必需的盐、铁、茶叶、烟叶、绒货等产品。这些产品汇集成巨大的商流源源不断地在中国与北亚至俄罗斯莫斯科的广袤地区流通了五百年，为中国乃至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有学者从以下四个方面对此进行了总结：一是开辟了远及莫斯科与欧洲其他地区的新“丝绸之路”，加强了区域经济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二是长途贩运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农副产品的商品化；三是四处设庄，推动了各地城市与集镇的兴起与社会风尚的变化，以至东北“先有曹家号，后有朝阳县”，内蒙古“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青海“先有晋益老，后有西宁城”之说历代相传；四是票号的异地汇兑和转账结算，大大促进了商品流通，作为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先驱在推动中国由农业经济社会向工业经济社会过渡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仅以洋务运动为例就可窥一斑而见全貌。19 世纪

^① 黄鉴晖：《晋商经营之道》，104 页，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01。

70年代洋务派共创建军工企业19家，耗银4500万两；创建民用企业23个，耗银1700万两。票号当时居于全国的核心地位，为洋务运动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信用支持。^①此外，晋商当时也吸纳了大量的就业人口，仅据山海关统计报告，当年东北沦陷时，大量的山西商人从关外返回，截至1933年7月1日就达17万之众，而这估计不及晋商在东北总人数的1/3。而1920年阎锡山接见因俄国“十月革命”而返回故里的山西商人时，汾阳的代表确认当时在俄罗斯的山西商人有1万人之巨。^②这其中涌现了大量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杰出经济人才，比如清朝户部银行的第一任行长就是出自乔家字号的贾继英。

1.2 晋商研究及其分类

因着晋商的巨大商业成就及贡献，民国以来晋商研究日渐兴起。纵观百年历程，学界普遍认为晋商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和两个方面^③。第一阶段是民国时期的研究，大致始于1905年，主要围绕票号展开研究，至20年代达到高潮。第二阶段是新中国成立后50年代至90年代末的研究，始于1959年中央关于搜集整理新中国成立前史料的号召，中间一度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改革开放后重新恢复，于90年代达到高潮。这一阶段的研究内容由票号扩展至整个晋商，有多项力图反映晋商全貌的研究成果问世。这两个阶段虽然时间跨度较大，但从研究方法来看，实际上可以归入一个阶段，因为主要都采用史学的研究方法，通过史料钩沉和阐微索隐去描绘一个真实的晋商发展与活动的历史画卷，重在晋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所不同的是，在第一阶段晋商与票号尚存，研究者或是票号中人，或可切近观察票

① 杜少军：《山西票号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与贡献》，见孔祥毅等：《山西票号研究》，40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② 孔祥毅等：《山西商人及其历史启示》，见李希曾：《晋商史料与研究》，10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

③ 刘建生、刘鹏生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5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号, 史料获得相对容易; 而在第二阶段, 晋商湮灭, 史料的获得只能通过明清时期的政府档案、政书奏折、方志史籍、晋商遗作和墓志传略及后人的调查访问等方式, 如此考据殊为不易。第三阶段是 2000 年以来的研究。这一阶段很多学者开始运用诸如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晋商的史料进行深度分析, 希望借此把晋商的研究推到一个更高层次, 甚至有学者呼吁对晋商的社会、经济、管理、伦理、文化、艺术、建筑等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 从而开创出与“敦煌学”、“徽学”类似的又一个独立学科体系——晋商学^①。

在晋商的研究过程中, 不同阶段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表 1—1 所示。

表 1—1 不同阶段晋商研究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及特点

阶段	年份	作者	成果名称	发表单位	成果类型	归类
第一阶段	1908 年	潘承弼	《中国之金融》	中国图书公司	著作	“历史 的晋商” 研究
	1917 年	东海	《记山西票号》	《东方杂志》, 第 14 卷第 6 号	论文	
	1917 年	李宏龄	《同舟共济》、《山西票商成败记》	太原监狱石印	著作	
	1923 年	马寅初	《晋商银行历史上之色彩》	《银行杂志》, 第 1 卷第 1 号	论文	
	1928 年	张辑颜	《中国金融论》	商务印书馆	著作	
	1930 年	杨荫溥	《上海金融组织概论》	商务印书馆	著作	
	1936 年	顾尊三	《山西票号之构造》	《山西票号史料》(未刊稿)	论文	
	1937 年	陈其田	《山西票庄考略》	商务印书馆	著作	
	1944 年	卫聚贤	《山西票号史》	说文出版社	著作	
第二阶段	1961 年	杨荣晖	《山西票号的性质与作用》	《光明日报》, 5月22日	论文	
	1961 年	刘静山	《祁县乔家在包头的复字号》	《山西文史资料》, 第 1 期	论文	
	1984 年	孔祥毅	《山西票号与清政府的勾结》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第 3 期	论文	
	1985 年	黄鉴晖	《山西票号资本特征》	《山西金融》, 第 4 期	论文	
	1989 年	编写组	《山西票号史料》	山西经济出版社	著作	
	1990 年	黄鉴晖	《山西票号史》	山西经济出版社	著作	
	1992 年	史若民	《票商兴衰史》	中国经济出版社	著作	
	1993 年	葛贤慧等	《明清山西商人研究》	香港欧亚经济出版社	著作	
	1995 年	张正明	《晋商兴衰史》	山西古籍出版社	著作	
	2001 年	黄鉴晖	《晋商经营之道》	山西经济出版社	著作	
第三阶段	2002 年	孔祥毅等	《山西票号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论文集	“晋商 的历史” 研究
	2005 年	刘建生等	《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	山西人民出版社	著作	
	2008 年	郑文全、卢昌崇	《耦合、效率与委托代理问题》	《管理世界》, 第 8 期	论文	

① 孔祥毅等:《山西票号研究》, 序言第 2 页,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晋商研究本质上是一种经济史研究。根据研究方法的不同,经济史向来有“描述性经济史”与“分析性经济史”之分。描述性经济史主要对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客观描述,所回答的主要是“是什么”的问题(如在整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方面是如何演变的,轨迹如何,其作用、意义和影响如何等)。这类研究一般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概念框架以及特定的理论研究方法,但却特别强调描述的客观性和全面性,是任何严肃认真的经济分析的出发点。虽然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够看出作者的立场、观点、方法和观察角度受到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但特别强调论从史出。这类著作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为更深入的经济史研究提供一个研究平台和检验经济理论正确与否的试验场,《剑桥欧洲经济史》即是描述性经济史的典范。分析性经济史主要是依据某种具体的经济学理论,对经济史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分析研究,从而给出自己的解释,并以此证实或者证伪某种经济学理论。它特别强调特定的经济学理论对于经济史研究的指导意义,强调将理论与经济史研究结合起来,强调以论带史。这类研究的目的不仅仅是了解经济史的一般演进过程,而且要进一步解释某些经济事件在历史上发生的原因、内在机理、具有的理论含义以及对于经济学理论演进的意义。明确的理论依据、内在逻辑严密的概念体系、清晰的理论分析框架以及严格的推理方法是这类研究的显著特点^①。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道格拉斯·诺斯的《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布劳代尔的《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以及钱德勒的企业史研究名著《看得见的手——美国企业的管理革命》即是这类研究的经典著作。尽管分析性经济史是近年来经济史研究的一个重

^① 有关描述性经济史与分析性经济史之间区别与联系的更详细的分析见王春法为 M. M. 波斯坦、H. J. 哈巴库克等主编的《剑桥欧洲经济史》(共8卷9册)中译本所写的译序第3~4页,本处的分析源自于此。(英)M. M. 波斯坦、H. J. 哈巴库克:《剑桥欧洲经济史》(共8卷9册),王春法等译,译序,3~4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

要发展趋势，但任何一本好的经济史著作都应该有效地将描述与分析结合起来，因为没有符合历史真实的经济描述就不可能有好的经济史分析。历史与经济分析应该是不分家的，这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依据经济史研究的描述性与分析性之分，晋商的研究也可以分为“历史的晋商”和“晋商的历史”两个方面^①。“历史的晋商”强调运用史学的研究方法将晋商的发展历史搞清楚，通过诸多史实的廓清和排序去还原历史上真实的晋商，关心的是“晋商是什么”的问题。而“晋商的历史”则强调在某种理论的指引下对晋商的史料进行逻辑分析，重在探索现象背后的一般性规律与原则，关心的是“晋商为什么”的问题，期望能够说明晋商兴衰表象背后的“兴道”、“盛因”与“衰故”，也期望借此研究能够证伪某些西方经济理论或者总结出若干与西方不同的经济理论。从晋商研究的两个方面去考察晋商研究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第二阶段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历史的晋商”研究，第三阶段的研究基本上属于“晋商的历史”研究。随着晋商史料的不断丰富与廓清，需要不断引入新的理论和方法对这些史料进行深度分析和诠释，“晋商的历史”研究将成为晋商研究的主流，但是，由于晋商的历史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这一领域有份量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见，有深度的分析性案例研究成果更是少之又少。

1.3 本书的研究设计

本书是“晋商的历史”研究的一种，脱胎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的课题《乔家字号：一个蕴含着现代企业本质特征的经济组织》（以下简称《乔家字号》）和教育部“十五”规划课题《身股制：

^① “历史的晋商”和“晋商的历史”的分类始见于刘建生、刘鹏生等：《明清晋商制度变迁研究》，6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

一项挑战西方经典企业理论的制度安排》(以下简称《身股制》),最初主要想运用肇始于科斯的新制度经济学和现代企业理论来分析以晋商企业制度为代表的我国近代企业制度发展演变的基本特点、发展路径以及其中所蕴含的现代企业的本质特征。当时之所以选择这一主题开展研究,是因为本课题的研究人员在此前的研究中深刻地感受到晋商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优秀的企业制度设计,更为重要的是晋商的制度设计与西方的经典企业制度很不相同,这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中西方企业制度具有差异性以及企业制度发展演进具有社会嵌入规定性的案例,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对我国当时如火如荼开展的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企业改革和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同时对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也具有深刻的启迪。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开展,作者才将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分析不断拓展到票号的本质、相与制度的债务合约分析以及晋商衰落的产权制度分析等方面,从而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从晋商的产生,到存继期的企业制度和经营方式,再到晋商衰落的整个过程的具有分析性经济史性质的研究。

1.3.1 乔家字号的案例选择

晋商企业制度研究的重要意义已为学界所公认。2002年百余位国内外晋商研究专家和学者聚首龙城太原召开“山西票号国际学术会议”,会议提出的“龙城宣言”就达成共识,“山西票号及晋商在其经营活动中积累的管理经验、管理制度、企业文化等丰富的成就,对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是如何找到一个好的切入角度并非易事。经过斟酌,当时我们决定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乔家字号的剖析来分析晋商企业制度。

在明清十大商帮中,晋商冠居第一,而在晋商团体中,祁县乔家是极为典型的一家,常有“晋商十大财东,乔家冠居首位”之说。